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

日期：2014年6月19-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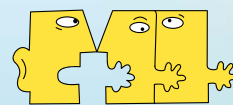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李兆基樓五號演講廳

研討會手冊

主辦機構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Centre for Sign Linguistics and Deaf Studies

贊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JOCKEY CLUB SIGN 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PROGRAMME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

目錄

歡迎辭.....	1
鳴謝.....	2
統籌.....	4
大會議程.....	5
主題演講.....	8
Bencie WOLL.....	8
Rachel I. MAYBERRY.....	9
Anne E. BAKER.....	10
Shirin D. ANTIA.....	12
Carl J. KIRCHNER.....	14
特邀演講.....	16
李月裳.....	16
鳥越隆士.....	18
邢敏華.....	19
摘要.....	21

歡迎辭

歡迎各位參加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本次研討會旨在與學者、專業人員及聾童家長一起分享由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開展的“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2006-2014）”的最新實證研究成果。此項目得到了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捐助。

手語語言學作為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在六十年代開始興起，引發了更多的研究去探討在手語雙語模式中，自然手語在聾童成長及接受教育中所擔當的角色。自此，手語雙語模式便在部份聾校中開始實施。近年來，配合共融理念，主流學校逐漸引入手語雙語教育模式，將一定數量的聾童安排到主流班級，由一名主要使用口語教學的健聽老師和一名使用手語教學的聾人老師於課堂上協同授課。這樣，手語雙語獲得了新的詮釋，那就是提升手語和口語、口語和書面語的合作關係，以幫助聾童更好地發展語言和社交，並在主流學校環境下取得更好的學業成果。這種新的聾教育理念，得到了聾教育界廣大研究者及教育家的關注，越來越多的此類項目也在世界各地開展起來。本次研討會旨在剖析以上問題，以回應當前聾人教育研究領域中對於手語雙語及其實行計劃的實證研究的需求。研討會將集中探討在香港主流學校裡實施手語雙語需要的要素，希望為聾人教育研究帶出新的方向。

本次研討會匯集了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領域中國際知名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他們將在研討會中分享經驗並交換意見。在此多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大力贊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的支持，讓是次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希望是次研討會令您滿載而歸，成為一次難忘的回憶。

鄧慧蘭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主任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

鳴謝

贊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JOCKEY CLUB SIGN 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PROGRAMME

鳴謝

支持機構



Centre for Education Research Partnerships,
N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for the Deaf,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ttp://www.rit.edu/ntid/cerp/>



江蘇高校語言能力協同創新中心

<http://yynl.jsnu.edu.cn/>



Deafness Cognition and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ttp://www.ucl.ac.uk/dcal/>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http://www.ied.edu.hk/sec/>



國家手語和盲文研究中心 (中國)

<http://ncslb.bnu.edu.cn/>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語言及溝通障礙研究技術中心

<http://www.lcd-cuhkszri.org/>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傳意科學研究所

<http://www.ihcr.cuhk.edu.hk/>

統籌

統籌委員會

鄧慧蘭 (主席)

姚勤敏

李然輝

程 琪

楊一可

李 群

李 佳

李怡萱

陳昕婷

李潔瓊

技術支援

余文謙

鄭家耀

林智輝

黃卓翰

大會議程

第一天 2014 年 6 月 19 日 (星期四)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李兆基樓五號演講廳 (LT5)

13:00 - 14:00	註冊及接待	
14:00 - 14:30	開幕典禮	
主題一：語言輸入		
14:30 - 15:10	主題演講 1	Bencie WOLL <i>為甚麼手語有助於開發大腦？</i>
15:10 - 15:40	一般演講 1	姚勤敏、林玉秋、劉曉眉 <i>早期手語輸入是否對聽覺腦幹植入的聾童有幫助？</i>
15:40 - 16:00	茶歇	
16:00 - 16:40	主題演講 2	Rachel I. MAYBERRY <i>嬰兒語言如何開啓兒童大腦閱讀之門</i>
16:40 - 17:10	一般演講 2	李群、鄧慧蘭、姚勤敏、林慧思 <i>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生讀寫能力的發展</i>
17:10 - 17:40	討論一	

第二天 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李兆基樓五號演講廳 (LT5)

8:30 - 9:00	註冊及接待	
主題二：語言發展與語言評估		
9:00 - 9:40	主題演講 3	Anne E. BAKER <i>聾童語言能力評估</i>
9:40 - 10:10	一般演講 3	施婉萍、鄧慧蘭 <i>聾及弱聽兒童語篇指涉策略的雙模式雙語發展</i>
10:10 - 10:40	一般演講 4	李佳、李然輝、鄧慧蘭、林慧思 <i>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童香港手語的發展</i>
10:40 - 11:00	茶歇	
11:00 - 11:30	特邀演講 1	李月裳、劉曉眉、林玉秋、林浩鏞、鄧慧蘭、 姚勤敏 <i>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童口語的發展</i>
11:30 - 12:00	一般演講 5	林玉秋、劉曉眉、余成 <i>主流學校中聾童言語感知及口語的發展</i>
12:00 - 12:30	一般演講 6	劉愷欣、張嘉鏐、李月裳 <i>主流學校中聽障兒童廣東話聲調的表達</i>
12:30 - 13:00	討論二	
13:00 - 13:45	午餐	
13:45 - 15:00	記者招待會/教學及研究資源展示+茶水	
主題三：手語雙語計劃中的聾健教師		
15:00 - 15:30	一般演講 7	王芾 <i>聽障學生參與共融計劃情況：香港一項探索性研究</i>
15:30 - 16:00	一般演講 8	宋良昇、周思嘉、姚勤敏、潘若詩 <i>從聾人教師的角度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i>
16:00 - 16:30	茶歇	
16:30 - 17:00	一般演講 9	何智敏、姚勤敏、潘若詩 <i>從學生的角度看聾人教師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中的角色</i>
17:00 - 17:30	討論三	
18:00 - 20:00	招待晚宴	

第三天 2014年6月21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李兆基樓五號演講廳 (LT5)

8:30-9:00	註冊及接待	
主題四：普通環境下的聾人教育		
9:00 - 9:40	主題演講 4	Shirin D. ANTIA <i>將融合變成現實：邁向成功的一些因素</i>
9:40 - 10:10	一般演講 10	姚勤敏 <i>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健學生的社會融合</i>
10:10 - 10:30	茶歇	
10:30 - 11:00	特邀演講 2	烏越隆士 <i>甚麼是“共融”實踐？一項比較研究</i>
11:00 - 11:30	特邀演講 3	邢敏華 <i>臺灣聾教育近來政策與實踐的改變： 手語雙語之路</i>
11:30 - 12:10	主題演講 5	Carl J. KIRCHNER <i>教育的成功=環境的改變</i>
12:10 - 12:40	討論四	
12:40 - 12:50	閉幕典禮	

主題演講 (按發言順序排列)



Bencie WOLL

倫敦大學學院

Bencie WOLL 於 1978 年在布里斯托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 開始進行手語及聾人研究，她也是該校聾人研究中心 (Centre for Deaf Studies) 的創建人之一。1995 年，她到倫敦擔任英國首個手語及聾人研究學科主管。2005 年至今，她在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擔任教授，並兼任該校聾人、認知及語言研究中心 (The Deafness, Cognition and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主任。該中心為歐洲同一領域最大型的研究機構，有約 30 位研究生、研究員和副研究員，其中三分之一為聾人。她的研究和教學興趣相當廣泛，包括手語語言學、英國手語及聾人社群的歷史、社會語言學、聾童語言發展、手語及口語的神經科學、發展性及獲得性手語障礙等。2012 年，她成為英國國家學術院 (British Academy) 院士。

“為甚麼手語有助於開發大腦？”

摘要:

人工耳蝸植入對於恢復重度 (71-90 分貝) 或極重度 (大於 91 分貝) 失聽兒童的聽力是一項非常成功的干預手段。然而，接受了人工耳蝸植入手術的兒童在學業表現上 (包括讀寫能力與考試成績) 依然落後於同齡的健聽學生。一些關於動物失聽模型和人類神經影像的研究提出，交互性可塑性 (cross-modal plasticity) 會危害大腦聽覺皮層的功能。這種現象被歸因於視覺語言的使用，如手語或伴隨聽覺言語信號的唇讀。一些帶有感情色彩的術語，例如“聽覺皮層受侵”，暗示著一種與視覺語言的使用相關的病變過程。在本文中，我們提出“敏感期”包括聽覺敏感期和語言敏感期，因此動物模型並不能給出全面的描述。儘管這些假設較為盛行，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植入人工耳蝸後效果不好與視覺語言的使用有關係。聽覺皮層的跨模塊重組是失聽 (聽覺剝奪) 的結果，但是這一現象的發生與補償性手段 (例如手語的使用) 無關。相反，敏感期早期語言輸入的缺失一向與之後不理想的語言發展直接相關。交互性可塑性可以通過早期植入人工耳蝸減輕。然而，在考慮人工耳蝸植入手術成效參差不齊時，語言敏感期卻通常被忽略，這導致了在人工耳蝸植入康復過程中對視覺語言的毫無根據的誤解。

備註：感謝主題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主題演講



Rachel I. MAYBERRY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Rachel I. MAYBERRY 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語言學系教授，同時兼任該校多模式語言發展實驗室 (The Laboratory for Multimodal Language Development) 主任。她致力於各種形式的語言發展研究，包括手語、口語及書面語。過去幾年，她的研究主要關注以下幾個重要問題：1) 通過語言發展和大腦影像研究，考察語言關鍵期的本質；2) 通過綜合分析和眼動研究，探索手語熟練度是否與閱讀能力相關，以及兩者是如何關聯的；3) 通過對手語中手勢和慣用手 (handedness) 的研究，考察一般認知原則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手語語言結構的形成。她進行的研究目前由 Kavli Foundation 和美國國立耳聾與其他交流障礙性疾病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資助。她曾獲頒多個榮譽與獎項，她的研究成果也常被出版於各類國際學術論文集、著作及期刊，例如《認知、大腦與語言》 (Cognition, Brain and Language) 、《應用心理語言學》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等。

“ 嬰兒語言如何開啓兒童大腦閱讀之門 ”

摘要：

手語的語言結構與口語相似，手語的理解與產出亦與口語類似。然而，不同於健聽兒童自出生起就開始獲得口語，聾童往往過了幼兒早期才開始獲得手語。在本次演講中，我將從語言獲得和大腦語言加工這兩個不同的角度，討論近年來針對早期語言輸入貧乏所造成影響的研究。首先我們將談論如果開始獲得手語的時間已過了幼兒期，那麼手語獲得的具體情況和發展軌跡會是怎樣。其後，我會討論缺乏早期語言獲得的成人，其大腦如何加工處理手語。這兩方面的研究顯示，如果缺乏來自周圍環境的語言刺激，嬰兒獲得語言的非凡能力將會減弱。如果幼兒早期的成長環境缺少語言輸入，他們只能學會簡單的語言結構，而且成熟後的大腦將以非典型的方式加工處理語言。因此，研究較晚開始獲得語言對語言和神經的影響，有助於解釋為甚麼手語水平高的聾人讀寫能力更好，以及為甚麼許多聾生學習閱讀十分吃力。

備註：感謝主題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主題演講



Anne E. BAKER

阿姆斯特丹大學

Anne E. BAKER 現為阿姆斯特丹大學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的名譽教授。1975 年，她在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 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1985 年在其任教的德國杜賓根大學 (Tübingen University (Germany)) 獲取特許任教資格。1986-1988 年，她在英國約克大學任高級講師。隨後，她被任命為阿姆斯特丹大學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人文學院心理語言學、語言病理學及手語語言學系主任。1994-1997 年，她在學院委員會 (Faculty Board) 擔任副院長一職，並於 2002-2009 年期間擔任阿姆斯特丹語言與溝通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institute Amsterdam Centre fo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主任。2003-2009 年，她也是佛蘭德科學委員會 (Flemish Scientific Council) 的成員。目前，她擔任手語語言學學會的主席，同時也是阿姆斯特丹認知科學中心 (Cognitive Science Center Amsterdam) 委員之一。她的研究領域為心理語言學，特別是口語及手語的語言獲得及發展性語言病理學。她對跨語言的語言獲得研究及語言與認知的關係尤其感興趣。她曾獲得多項國家或國際研究資金，並於 1990-1991 年及 2005-2006 年度成為荷蘭高等研究院 (NIAS) 院士。她的研究成果曾在眾多不同的國際論文集及期刊上發表，包括《手語及語言學》 (Sig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兒童語言期刊》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等。

“聾童語言能力評估”

摘要:

語言評估工具的基本目標是評定使用者的語言水平，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評估工具既可以用於學術研究，也可以用於實現診斷和教育目標。對聾童來說，語言評估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即為制定相應教學計劃提供重要的信息。這類評估必須涵蓋兒童所接觸的語言形式。同時，評估的使用需要具備一些評估工具的基本特徵，比如信度、效度和適用度等。

兒童語言能力的評估需要考慮他們所接觸的語言。就聾童而言，他們所接觸的通常是雙模式雙語，包括某種形式的手語以及口語。兒童獲取這兩種模式的語言輸入形式多樣，包括不同模式間如何結合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這些模式是兒童可接收的。任何一種針對雙語兒童的語言評估都需要考慮到這種多樣性。近些年開發的為多語兒童設計的問卷 (PABIQ : Tuller et al. 2014) 令我們得以為聾童開發評估工具，但是這項工作仍然充滿挑戰。

兒童雙模式雙語的產出同樣也給評估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由於手語的特殊情況，評估方面的某些要求難以實現，比如標準化。同時，有些手語的特性在評估中需要多加考慮，比如某些測試詞匯的形象性。另外，語言評估工具所使用的某一些類別的題目，例如非手語的重複，或者是圖片詞匯測試，都因手語的特徵給該類型的評估形式帶來一些具體的困難。針對雙模式雙語兒童的觀察性評估工具以及針對自然產出的語言分析同樣需要細緻的構建。報告中將會具體討論相關的評估工具。

備註：感謝主題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主題演講



Shirin D. ANTIA

亞利桑那大學

Shirin D. ANTIA 是亞利桑那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教育學院殘疾與心理教育系殘疾及康復研究的梅爾森特聘教授 (Meyerso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她自 1980 年開始指導聾及弱聽 (聾/弱聽) 學生的教育項目，並教授特殊學生語言發展、融合教育及研究等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課程。她是《聾人研究及聾教育期刊》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編輯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該期刊乃聾/弱聽教育的主要研究刊物。她也是聾教育委員會 (Council on Education of the Deaf) 的委員之一，曾經擔任聾/弱聽高等教育協會 (Association of College Educators-Deaf/Hard of Hearing) 主席，至今仍積極地參與各項職業訓練活動。她曾發表大量的論文及著作，內容涵蓋聾/弱聽學生的社交、社會接納及融合。她目前是聾人與讀寫能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Literacy and Deafness) 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該研究中心由教育科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資助。她曾被授予亞利桑那大學教育學院 " 伊拉斯謨學者 " 稱號 (UA CoE Erasmus Scholar)，並且因為她對這一領域的突出貢獻而榮獲聾/弱聽高等教育協會頒發的瑪麗德蘭尼獎 (Sister Mary Delaney Award)。

“將融合變成現實：邁向成功的一些因素”

摘要：

雖然許多聾及弱聽 (聾/弱聽) 學生與同齡的健聽學生一起就讀於主流學校，但專業人士及家長卻對他們的學業成就及社交成長表示擔憂。在美國，主流學校的班級通常只接納一名聾/弱聽學生。在學習上，這個學生會得到一位專門為聾/弱聽學生服務的老師 (聾生老師) 的學業指導。除此之外，他們還可能得到手語翻譯、聽力學家和言語專家的支援。這些支援的形式多樣，比如提供諮詢服務或每週提供若干小時的一對一學習指導。在這種情況下，支援的質量取決於有無聾生老師、這些老師所帶的學生數量以及校方對聾/弱聽學生需求的了解程度。

共融教育作為一種融合教育模式，強調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在學校和班級內部享有學業上及社交上的平等機會。其特徵包括：

- 1) 一個班級中聾/弱聽學生數量需要達到一定的比例；
- 2) 主流學校老師與聾生老師在課堂上協作教學；
- 3) 課堂上手語與口語的使用。

針對主流學校（包括共融班級）的聾/弱聽學生所取得的學業表現的研究表明，這些學生的學業成就高於全國聾/弱聽學生平均水平，但是低於同齡健聽學生。在社交能力方面，大多學生在教師評價和自我評價中處於中等水平。能夠預測他們學業和社交成就的要素包括：聾/弱聽學生參與課堂交流的能力；他們表達及理解方面的溝通技巧；他們在學校和社區參與課外活動的情況；必要時是否得到聾生老師和手語翻譯的恰當幫助；主流學校老師、聾生老師及手語翻譯之間的溝通情況。

本次發言的內容包括：

- 1) 討論不同形式的融合教育，包括共融教育，並解釋“主流”與“融合”的區別；
- 2) 報告主流學校環境下聾/弱聽學生的學業及社交成就；
- 3) 報告共融班級中聾/弱聽學生的學業及社交成就；及
- 4) 討論那些能夠令聾/弱聽學生成功融入班級和學校的要素。

備註：感謝主題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主題演講



Carl J. KIRCHNER

國立大學 - 聖地亞哥

Carl J. KIRCHNER 出生在聾人家庭（聾父母所生的孩童，簡稱 CODA），在其五十四年的專業教育生涯中一直致力於為聾及弱聽（聾/弱聽）的學生和成人服務。

在擔任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 Northridge）

助理教授及副教授期間，他曾創辦了聾/弱聽預備教師項目。他是私營洛杉磯 K-12（即橫跨幼兒園到高中的基礎教育階段）聾/弱聽學校（TRIPOD）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該校行政主管及教育總監。他長期在寄宿學校、特教班及主流學校工作，並曾出任加利福尼亞州教育部教育顧問一職。他還曾擔任南加州聾人傳譯員註冊機構（SCRID）、國家聾人傳譯員機構（RID）以及美國聾人教育工作者大會（CAID）的主席。目前，他在位於加州拉霍亞的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La Jolla, California）擔任兼職教師。同時他也是“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海外顧問，為計劃中的工作人員提供支援。

“教育的成功 = 環境的改變”

摘要：

在《愛麗絲鏡中奇遇》這本書中，海象與木匠一起走在海灘上。海象說：“有好些事情到了該談談的時候了。”很遺憾，在聾教育領域中有太多問題我們已經談了太久，但卻鮮少或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在長達 150 多年的時間裡，聾生一直都忍受着人數稀少的班級、獨立的課室、語言有限的同齡人、不恰當的年齡分組、無法像健聽同齡人那樣挑戰學業難題，以及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由於不正確的觀念，這些情況仍在繼續。這正是由於一貫認為聾及弱聽兒童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填鴨式課程安排，而非自上而下式的，但實際情況則需要同時使用上述兩種方法，並且更為重要的是環境的改變。

從教師從業者的角度來看，當前教育的成功與否主要是靠學生的手語運用情況以及老師有限的教學方法來衡量的。這些雖是必要的，卻不能滿足學生的全部教育需求。一直以來，聾教育被過分控制並局限在一個有限的環境裡面。同時被忽視的還有學生們需要通過與外界的社會交往，從自身所屬文化群體以外的世界獲取信息。社會行為會潛移默化地改變學生的行為，帶來教育上的挑戰，鼓勵學生追求比專業人士所謂的“成功”更高的成就。基於這個原因，教師們必須走出舊的聾教育框架，用他們的目標、策略、方法以及對手語的足夠重視創造出一個豐富多樣且有趣的學習環境。更重要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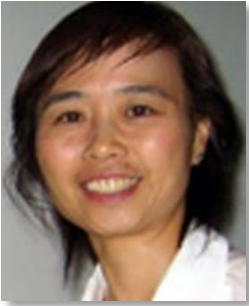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

教師們要打破舊有的聾教育局限，引領學生走向光明。回到本文開頭在海灘上行走的那兩個角色間的對話，“如果這些都被清除了”，他們說，“那就太好了！”

備註：感謝主題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特邀演講 (按發言順序排列)



李月裳

香港中文大學

李月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副教授兼言語治療科主任。作為一名資深的言語治療師，她自 1995 年起廣泛參與設計針對不同人士需要的評估工具及康復計劃。她開發了一系列的測試工具，包括《香港粵語詞彙理解測驗》(CRVT)、《廣東話基礎言語感知測驗》(CBSPT) 和《香港粵語聲調辨識測驗》(CANTIT)。她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兒童言語及語言發展、香港粵語聲調感知與表達、測驗工具標準化及實效性評估等。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的聾童口語發展”

摘要:

研究目的:

探討香港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下，粵語聽障兒童口語的發展，並將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聽障學生的口語發展與其他主流學校的聽障學生進行比較。

研究方法:

本研究觀察了 14 名就讀於香港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聽障兒童的口語能力。我們於兩個不同的時間點，以《香港兒童口語(粵語)力量表》(Hong Kong Cantonese Oral Language Assessment Scale · HKCOLAS) 進行測試。這兩個時間點相差大約 3 年 (+/- 0.5 歲)。之後，再根據兩個時間點的結果，用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測試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test) 進行分析。此外，我們把其中 12 名兒童的測試結果與來自其他主流學校的 16 名聽障兒童進行比較。在控制了聽力損失程度與言語感知能力兩項因素後，我們使用重複測量共變數分析測試 (repeated measures ANCOVA test) 進行比較。

研究結果:

結果顯示，就讀於香港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下的兒童口語能力基本上都有進步。在六個語言範疇中，有五個他們表現出明顯的進步，包括粵語語法、篇章理解、詞語釋義、詞義關係以及故事重述。其中篇章理解方面的進步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

與其他主流學校聽障兒童的比較結果顯示，就整體的口語能力而言，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的兒童比那些就讀於其他主流學校的聽障兒童在口語發展方面表現出更快的進步。這種較快的發展模式在六個語言範疇中的四個明顯地表現出來，包括粵語語法、篇章理解、詞義關係及故事重述。

結論：

總體來講，參加了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聽障兒童在口語上都有積極的發展。並且，他們的口語發展比起其他主流學校的聽障學生進展要快。由此可見，接觸手語並沒有妨礙聽障兒童口語的發展。

備註：感謝特邀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特邀演講



鳥越隆士

兵庫教育大學

鳥越隆士於 1994 年獲廣島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隨後於 1996 年起出任兵庫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至今。在 1990-1996 年期間，他曾是國立殘疾人康復中心手語翻譯培訓計劃的講師。從 1993 年到 2013 年，他曾以訪問學者或訪問教授的身份在歐洲多所大學工作，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Stockholm University)、挪威奧斯陸大學 (University of Oslo) 以及芬蘭于韋斯屈萊大學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他的研究領域包括聾及弱聽學生的心理學和教育學研究、手語研究、發展心理學以及語言獲得研究。在上述每項研究領域中，他都在日本國內或是國際上以各種方式發表了眾多研究成果，包括期刊論文、著作章節和會議演講等。

“甚麼是“共融”實踐？一項比較研究”

摘要：

現今，在日本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許多聾及弱聽（聾/弱聽）兒童入讀主流學校而非專門為聾/弱聽學生所設的特殊學校。然而，不時會有報道稱這些就讀於主流學校的聾/弱聽兒童面臨諸多學業、社交及心理方面的困難與挑戰。就聾/弱聽兒童的手語雙語及全納式學習而言，共融教育可能是一項非常有前景的嘗試。我曾到訪世界各地的多個共融教育項目（包括美國、意大利、挪威和香港），發現他們在課堂實踐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與多樣性。我暫且把共融教育定義為：1）聾/弱聽兒童（一組而非一個）與健聽兒童同處一個課室；2）普通教育老師與特殊教育老師（或聾人老師、手語翻譯員）協同教學；3）手語及口語都是教學語言。本文將討論我對各地共融教育項目的親身觀察和經歷，包括日本（儘管它還處於剛起步階段），並且比較他們在共融課堂中的做法。更具體來說，我將會關注以下幾個問題：好的共融教育課堂由哪些因素構成？面臨哪些挑戰？教師之間如何共同協作，為健聽和聾/弱聽學生營造雙語及合作的學習環境？在共融教育環境下，手語和口語之間有甚麼關係？

備註：感謝特邀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特邀演講



邢敏華

國立台南大學

邢敏華，國立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她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至美國哈定-西蒙斯大學 (Hardin-Simmons University in Abilene, Tx. USA) 攻讀她的第一個普通特殊教育碩士學位。隨後十年，她回到台灣並在台北市立啟聰學校任中學老師。同時，還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取得第二個教育碩士學位。她又繼續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於 1994 年獲教育博士學位。之後，她於國立台南大學 (原名國立台南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先後出任副教授及教授。她的研究興趣包括聾教育、手語教學、手語雙語模式與聾人研究等。現在，她效法香港的手語雙語模式，於台灣台南的幼稚園階段推行一項小型的手語雙語全納教育實驗。

“台灣聾教育近來政策與實踐的改變：手語雙語之路”

摘要：

在國際聾人教育領域，手語雙語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亞洲，手語雙語聾教育模式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日本等地實施。與此同時，台灣也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踐，包括：黃玉枝教授自 2006 年在高雄的一家民辦 (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幼兒園實施手語雙語閱讀模式；邢敏華自 2011 年以來，也效法香港的模式，在台南的健聽幼兒園 (臺南大學附小幼兒園) 裡開展了一項長達兩年的手語雙語部分融合實驗；2012 年秋至今，邢敏華在當地一所聾校的國小一年級課堂進行了一項手語雙語實驗；自 2014 年春季以來，邢敏華在南大附小幼兒園的課堂上進行了兩次為期一週的手語雙語完全融合研究 (Hsing 2014)。

近年來，在台灣，聾教育和手語政策方面的變化包括：全國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的公布和為手語翻譯員提供一種新的認證——乙級證照。同時，香港手語雙語團隊訪台並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也使台灣聾教育領域在實踐上發生了諸多的改變。例如，從那時起，張秀雯教授 (2014) 和劉秀丹教授 (自 2013 年起) 分別在台北和台中開展了一些嘗試性的項目。

然而，手語雙語聾教育模式在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台灣政府官員忽視台灣手語對於聾生的重要性，以及一些老師和家長不願意改變觀念等等。我們的結論是，手語雙語的聾人教育模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

式對於健聽學生和聾生都是有幫助的，這樣的模式也是可以實現的。在台灣，手語雙語之路已經開始，然而我們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備註：感謝特邀演講嘉賓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摘要

一般演講 1

早期手語輸入是否對聽覺腦幹植入的聾童有幫助？

姚勤敏、林玉秋、劉曉眉

目前，腦幹植入 (Auditory Brainstem Implant，簡稱 ABI) 對於沒有聽覺神經的聾童或由於患有一些耳疾而無法受惠於人工耳蝸手術的人來說，已成為了另一種選擇 (Colletti 及 Shannon 2005)。不過，腦幹植入的感知效果卻因人而異 (Pallares 及 Diamante 2011)。對於無腫瘤的接受聽覺腦幹植入者，這項手術在言語感知和對環境聲音的感知方面都有所幫助，只是他們仍得面對口語語言輸入不充分的危機。

近來手語語言學及手語語言獲得方面的研究進展讓我們得知手語可以幫助口語語言發展，包括口語和書面語。本文作為一項個案研究，考察了兩名接受了腦幹植入手術的聾童的語言發展，其中一位從一歲三個月開始接收手語語言輸入，另一位則由五歲六個月開始接收手語語言輸入。

他們年齡相仿，開始考察時，KC 六歲七個月，MY 六歲八個月，兩人的父母都為健聽人士。兩位聾童皆為極重度 (大於 90 分貝) 聽障兒童，在數月前嘗試過人工耳蝸手術的成效之後，分別於兩歲八個月及三歲五個月接受了腦幹植入手術。

我們從如下幾個方面，對 KC 和 MY 的測試結果進行了比較：1) 他們的口語語言能力，包括言語感知、詞彙接收能力、對廣東話的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2) 他們的中文詞彙和語法知識；3) 他們香港手語的語法知識和敘事技巧。結果顯示，KC 在語言感知、接受性詞彙和語言理解能力上，與 MY 相似。但是 KC 在書面漢語的詞彙和語法知識兩方面都比 MY 要好。最後，當考慮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時，我們發現 KC 的進展遠超 MY。六歲十個月時，MY 的口語只相當於兩歲七個月的水平；但 KC 自從加入了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SLCO) 後，他在口語表達方面的發展進展顯著。

由於較早接收手語語言輸入，KC 的香港手語語言能力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而 MY 作為一個香港手語遲學者，仍然在很吃力地嘗試掌握這門語言。這項關於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環境下腦幹植入聾童的初步研究，提示我們早期手語語言輸入並不妨礙他們的口語語言發展。在雙語共融教育環境下，手語語言發展的進步可以很好地支持聾童的口語語言發展。

參考文獻

Colletti, V. & Shannon, R. V. (2005). Open Set Speech Perception with Auditory Brainstem Implant? *Laryngoscope*, 115, 1974-1978.

Pallares, N. & Diamante, V. (2011). Auditory brainstem implant in four children with cochlear nerve apl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 Otorhinolaryngology*, 75 (Suppl1), 55.

Reynell, J. K. (1987). *Reynell Developmental Language Scales, Cantonese Edition* [based on the 2nd edition of 1977], Windsor: NFER-Nelson.

一般演講 2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生讀寫能力的發展

李群、鄧慧蘭、姚勤敏、林慧思

無論是聾生還是健聽學生，一個重要的教育需要就是發展讀寫能力，並且讀寫能力還是直接影響他們學業表現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然而，聾生長期在語法發展、閱讀理解和書面表達上遇到困難和挑戰 (Kelly 1996 ; Berent 2001 等)。失聽、語言經驗以及其他各種因素造成聾生在學習基於口語的書面語形式時遇到重重障礙。在香港，中文書面語的語法與普通話一致，而非廣東話。健聽兒童可能會利用他們已獲得的廣東話詞彙及語法來學習書面形式的普通話，作為一門第二語言。但是，聾童通過口語訓練獲得的廣東話能力有限，再以此為基礎去學普通話則十分困難。

根據語言相互依存假說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 Cummins 2006)，如果在語言環境中有足夠的語言輸入和學習動力，第一語言的知識，包括手語，都可能轉化到第二語言。2006 年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在香港開始實施，除了廣東話口語，還在課堂中引入手語作為課堂教學語言，以幫助聾生發展中文書面語及讀寫能力。詞彙和語法知識是讀寫能力發展的基礎，因此本文研究共融計劃中的聾生對中文詞彙和語法知識的掌握，進而探討他們在手語雙語環境下讀寫能力的發展。

研究發現，在共融環境下，儘管聾生詞彙發展的速度與健聽同齡學生相比仍然有所滯後，聾生的詞彙知識卻呈逐年顯著增長 (從一年級到三年級)。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發現，年級和聽力程度之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F(2.13, 161.33) = 14.69, p < .01, \text{partial } \eta^2 = .162$)，但是這一差異只存在於詞彙表達能力中，在詞彙理解能力中則沒有發現。中文語法知識評估的結果顯示，所有學生的語法能力都隨著年級的增長而增長，共融計劃中聾健學生之間語法評估的差異只出現在一年級 ($t(67) = -2.172, p < .05$)，從二年級開始則無差異。最後，回歸分析顯示聾生中文詞彙 ($r = .915, p < .01$) 和中文語法能力 ($r = .793, p < .01$) 與他們的讀寫能力顯著相關，並且是預測聾生讀寫能力發展的重要因素 ($F(4,7) = 14.817, p < .01, R^2 = .834$)。

參考文獻

Berent, G. P. (2001).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learners' grammar development. In D. Janáková (E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eaching English to Deaf and Hard-of-Hearing Students at 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s of Education: Proceedings* (pp. 124-134). Prague, Czech Republic: Charles University, The Karolinum Press.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

Cummins, J. (2006, Octob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English acade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hoices in Educating Minority Group Student, Norway.

Kelly, L. (1996). The interaction of syntactic competence and vocabulary during reading by deaf student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1), 75–90.

一般演講 3

聾及弱聽兒童語篇指涉策略的雙模式雙語發展

施婉萍、鄧慧蘭

本文通過分析聾及弱聽（聾/弱聽）兒童使用廣東話和香港手語進行故事敘述的情況，研究聾/弱聽兒童語篇指涉策略的雙模式雙語發展。所考察兒童現就讀於香港“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合作學校。在這個計劃下面，聾健兒童同班學習，香港手語和廣東話同為兩種主要的教學語言。

語篇指涉是指語篇中指稱對象得以引出、維持及重申的手段。通過考察兒童故事敘述中語篇指涉策略的發展模式，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兒童如何獲得各種名詞形式以及如何逐漸掌握通過使用正確的形式以滿足聽話者交流需求的語用知識（Wong 及 Johnston 2004）。健聽兒童通常要到十歲以後才能完全掌握口語的語篇指涉特點（Hickmann 2003）。語前聾童由於有聲語言輸入缺乏的原因，其口語發展往往比同齡的健聽兒童遲緩得多。而對於香港聾/弱聽兒童來說，獲得廣東話的名詞短語結構以及語篇指涉能力就更難了。因為在香港，他們通常還要學習普通話語法的中文書面語。這種中文書面語，無論在光桿名詞的句法角色方面，抑或量詞在形成定指與非定指的作用方面，都與廣東話大相逕庭。同其他手語一樣，香港手語在指稱對象的追蹤方面對空間的依賴程度非常高。相關的空間指涉手段包括指稱對象的空間索引、動詞一致、量詞謂語以及角色轉換（參見 Morgan 2002, 2005; Morgan 及 Woll 2003）。聾/弱聽兒童是如何逐漸掌握這些空間機制的呢？在還未學會如何使用空間之前，聾/弱聽兒童會使用何種策略？當聾/弱聽兒童要同時學習兩種語言，即口語和手語的語篇指涉特點時，又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他們是否能區分兩種語言系統？是否會有語言間的相互遷移？如果是，遷移方式有哪些？本研究通過考察就讀於共融計劃的 15 名聾/弱聽兒童廣東話和香港手語語篇敘述能力的發展，旨在回答上述幾個問題。

我們的研究數據顯示，對於兩種語言，聾/弱聽兒童起初都會使用很高比例的光桿名詞來實現指涉目的。隨著手語熟練程度的提高，他們會越來越多地使用諸如指示手語符號和動詞一致這樣的空間手段，從而導致光桿名詞使用頻率的逐漸下降。這些發展特征反映出聾/弱聽兒童的香港手語在不斷向成人語法靠近。相反，在他們的廣東話敘述產出結果中，光桿名詞在所有四類不同口語能力水平的被試學生中使用頻率都是最高的。這樣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由於香港手語中光桿名詞可以同時出現在有定和無定的語境裏面，廣東話中光桿名詞的高頻使用是否是語言遷移導致的結果？縱觀此項研究所收集的產出數據，對於口語及手語敘述中光桿名詞的使用沒有發現明確的相關性，所以我們認為廣東話產出中光桿名詞的高頻使用不能完全歸因於香港手語的語法遷移。我們將會討論其他可能對此造成影響的因素，如中文書面語、綜合發展問題以及缺乏有聲語言輸入而導致的語言獲得推遲等等。

參考文獻

- Hickmann, M. 2003. *Children's discourse: person, space and time across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G. 2002. The encoding of simultaneity in children's BSL narratives. *Journal of Sig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2, 127-161.
- Morgan, G.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in British Sign Language. In B. Schick; M. Marschark & P. Spencer (eds). *Advances in sign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deaf childr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G. & Woll, B.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reference switching encoded through body classifiers in British Sign Language. In: Emmorey K. (ed.) *Perspectives on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sign languag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97-310.

一般演講 4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童香港手語的發展

李佳、李然輝、鄧慧蘭、林慧思

從出生就接觸自然手語的孩童，可以毫不費力地將自然手語作為第一語言來獲得。早期語言獲得研究顯示，以手語為母語的聾童，其發展語法可以不斷接近以母語為手語的成年聾人的語法（引自 Chen Pichler (2010) 的美國手語研究；Morgan (2006) 的英國手語研究；Van den Borgaerde 及 Baker (2005) 的荷蘭手語研究）。此外，以手語為母語的聾童，他們語言發展的里程碑與健聽兒童發展口語的里程碑是相似的（Anderson 及 Reilly 2002；Lillo-Martin 1999；Mayberry 及 Squires 2006；Petitto 2000；等等）。但是，大部分聾童都生長在健聽父母家庭，他們在幼年時期很少或根本沒有接觸過手語，這類聾童獲得手語的起始年齡差異很大。本文主要探討語言關鍵期對遲學香港手語（HKSL）的聾童，在香港手語的獲得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

四名極重度（大於 90 分貝）健聽父母所生的聾童（DH）參與了是次研究，他們都來自 SLCO 計劃，都是 6 歲以後才開始學習香港手語的。其中有三名聾童在 3;2-5;1 歲期間植入了人工耳蝸，另外一名聾童從 3;2 歲開始配戴助聽器。在學校裡，他們同時獲取香港手語和粵語的語言輸入。在收集語料時，他們平均已有 6 年的香港手語學習經歷。此外，有兩名聾人家庭出生的聾童（DD）也參與了是次研究，他們分別是從 1;3 和 1;9 開始學習手語的，平均接觸香港手語的時長為 10 年。我們設計了三種表達測試來檢測這些聾童的香港手語語法發展：1）圖片描述：量詞結構和否定形式；2）誘導表達：wh 疑問句；3）故事複述：動詞一致關係和情態詞。

總體來說，雖然 DH 開始學習 HKSL 的時間較遲，但 DH 經歷了和 DD 相似的發展過程。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歸於 DH 六年來所處的豐富的語言環境。在這個豐富的語言環境中，DH 可以通過和聾人老師及 DD 同學們之間的互動，持續獲取豐富的 HKSL 語言輸入。這類手語輸入，無論從量還是質上來說，對遲學 HKSL 的 DH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的。

但是，這些 DH 遲學者還沒有完全掌握香港手語的各項語法知識。雖然他們在表達情態詞、wh 疑問詞和量詞結構的句法位置時的正確率分別高達 97%、75%和 72%，但他們在表達正確的非手控特徵，尤其是那些表現 wh 疑問句中句法轄域的非手控特徵，其正確率只有 35%。而且，他們在動詞一致關係上的表現也很差（正確率為 33%）。值得一提的是，對那些 DH 遲學者來說較難掌握的句法結構，也正是以手語為母語的單語 DD 們較晚獲得的句法結構。考慮到我們研究中的 DH 和 DD 都是手語口語雙語兒童，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他們能否最終達到跟以 HKSL 為母語的單語成年聾人一樣的表現，以此證明他們是否能夠完全獲得非手控特徵和動詞一致關係。

在我們的 DH 被試中，我們也觀察到個體差異。LKY 已經掌握大部分香港手語的語法特徵（平均正確率為 90%，除了動詞一致關係），但是 TWK 在動詞一致關係、wh 疑問句和量詞結構上的表現都很差（平均正確率分別為 33%、42%和 43%）。考慮到這些 DH 的口語能力，TWK 在粵語言語感知（CANSWORT: TWK-56%；LKY-0%）和粵語語法知識（HKCLOAS: TWK-77%；LKY-37%）上的表現都比 LKY 好，這就表明 TWK 可以很容易地通過粵語和香港手語獲取語言資訊。而對於 LKY 來說，由於他粵語的言語感知能力極弱（即 CANSWORT：0%），HKSL 是他唯一可以接收到的語言。因此，我們可以在 TWK 的 HKSL 產出中看到跨語言遷移的影響。通過對 TWK 進行偏誤分析，我們發現 TWK 在表達量詞結構時全部都採用粵語語序（量詞結構的語序正確率為 0%）。在表達 wh 疑問句的句法非手控特徵時，他有 91%的時間沒有使用句法非手控特徵，而是用口型講出粵語中相對應的 wh 疑問詞。這些研究發現表明，當聾童具備了一定的口語和自然手語知識時，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內化出文法手語。

上述結果顯示，將聾童長時間置於帶有不間斷的 HKSL 輸入的手語雙語環境中，這對他們的手語發展是有助益的。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來找出這些遲學 HKSL 的 DH 兒童是否最終能夠完全掌握所有的語法結構，進而證明語言關鍵期的影響是否存在於這類長期浸潤於手語雙語環境中的遲學手語者中。

參考文獻

- Anderson, D., & Reilly, J. (2002). The 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Normative data for American Sign Languag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7, 83-106.
- Chen Pichler, D. (2010). Using early ASL word order to shed light on word order variability in sign language. In M. Anderssen, K. Bentzen, & M. Westergaard (Eds.), *Variation in the input: Studi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word order; Studies in psycholinguistics, vol. 39* (pp.157-177).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 Lillo-Martin, D. (1999). Modality effects and modularit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T. Bhatia & W. Ritchie (Eds.), *Handbook of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531-56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ayberry, R. I., & Squires, B. (2006). 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K.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11, pp.291-296). Oxford: Elsevier.
- Morgan, G.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skills in British Sign Language. In B. Schick, M. Marschark, & P. E. Spencer (Eds.), *Advances in sign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deaf children* (pp. 314-34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titto, L. A. (2000). The acquisition of natural signed languages: Lessons in the nature of human language and its biological foundations. In C. Chamberlain, J. P. Morford, & R. I. Mayberry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eye* (pp.41-5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Van den Bogaerde, B., & Baker, A. (2005). Code mixing in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deaf families. *Sign Language & Linguistics* 8, 151-174.

一般演講 5

主流學校中聾童言語感知及口語的發展

林玉秋、劉曉眉、余成

目的：

一般研究結果認同聽障確實對言語感知能力及口語能力發展有負面的影響。但近年助聽科技的發展大大提升了聾童接收言語訊息及發展口語溝通的機會。配合以口語教學的融合教育模式是現時香港對聾人教育理念所持的大方向。這種教育模式被認為既可以增加聾人使用剩餘聽力的機會，亦可以提高聾人練習口語的機會。雖然這種教育模式已經實行多年，較有系統的聾人口語能力及發展研究卻少之又少。是次研究就是以為今後聾人教育研究提供基礎作為出發點，嘗試探討以下三個問題：1) 就讀主流學校的聾童的整體口語能力是怎樣的？2) 借助哪些因素我們能夠較好地推測聾童的口語能力？3) 隨著時間的推移，聾童口語的發展是怎樣的？

方法：

此項研究測試了共 111 位就讀於主流小學的聾童（失聽程度：輕度（26-40 分貝）至極重度（大於 90 分貝））。用於進行第一階段口語能力測試的工具包括：《香港兒童口語（粵語）能力量表》（HKCOLAS）；言語感知能力測試工具包括：《廣東話開放式字詞辨識測驗》（CLNT）及《廣東話聲調辨識測驗》（CanTIT）。相隔約三年時間（前、後半年之差），再用 HKCOLAS 測試了當中八十三位聾童的口語能力，而其中五十五位仍就讀小學的聾童數據則用作第二階段的分析。

結果：

整體而言，聾童的口語能力比健聽學童差。運用 HKCOLAS 的診斷原則及統計方法顯示，有多於六成受試的聾童有不同程度的語言障礙。多元綫性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聾童的廣東話聲調感知能力在眾多因素中，較能解釋個別變數的影響。關於聾童口語發展方面，大部份聾童（71%）在三年後仍停留在原有語言能力的組別，其中亦有口語降級（5%）及升級（24%）。

總結：

是次研究展示出正、負兩面的結果。一方面，我們得知有 35% 的聾童可以達到同齡健聽學童的口語能力；另一方面，我們亦發現有約三分之二就讀於主流學校的聾童存在口語理解及表達上的困難。相對聽力受損的級別而言，廣東話聲調感知能力更能推斷聾童的口語表現。聾童的口語能力會因時而變，然而，是甚麼因素導致聾童口語能力進步或退步，仍有待解答。

一般演講 6

主流學校中聽障兒童廣東話聲調的表達

劉愷欣、張嘉鏐、李月裳

本研究探討了主流學校中聽障兒童表達廣東話聲調的能力。87 名有輕度 (26-40 分貝) 至極重度 (大於 90 分貝) 失聽、年齡在 5.92 至 13.58 歲、在香港主流學校就讀的廣東話兒童參與了本次研究。其中大部份兒童 (65 人) 配有助聽器，17 名極重度聽障兒童和 1 名重度 (71-90 分貝) 失聽兒童植入了人工耳蝸，另外 4 名輕度失聽兒童沒有使用任何助聽設備。我們使用了《香港粵語發音測試》(Hong Kong Cantonese Articulation Test)，並由兩位作者及一位言語治療師對聽障兒童產出的聲調作出評分。我們發現聲調、失聽程度以及兩者的交互作用具有明顯的分組效應。重度聽障兒童的聲調表達明顯差於其他大部份兒童。在六個聲調中，高聲調 (聲調 1) 的表達最準確，而低聲調 (聲調 6) 的表達最差。結果顯示，在主流學校內的年數與這些兒童的聲調表達能力無關。針對聲調表達錯誤模式的分析發現，在聲調理解中較易混淆的模式在表達中也同樣存在。初始部份基頻 (F0) 相似的聲調同樣對聽障兒童的聲調表達造成困難。

備註：感謝報告者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一般演講 7

聾及弱聽兒童參與共融計劃情況：香港一項探索性研究

王蒂

共融教育模式使聾及弱聽（聾/弱聽）學生有機會和健聽同伴在普通班級裡進行學業和社交上的融合，並得到聾人教師以及普通教師的共同指導。在學校裡，學生得到融入在同一個社交體系裡的經歷，並且學會在班級的文化環境中如何使用語言。他們還通過和教師及同伴的互動來建構意義（Biederman 2003）。有鑒於此，我們希望考察共融課堂這個文化社群。在這個班級社群中，聾健成員都通過日常互動逐漸建構起新的文化。

這項研究從三個角度考察了由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組成的班級社群的融合情況。首先關注的是同伴互動中的語言選擇（記錄並分析學生使用手語和口語的比例及內容）；其次關注的是這些參與者的互動模式，包括發起-回應模式、反饋/跟隨（IRF）模式以及課堂互動分析（三元對話）模式，最後一個模式由 Lin（2007）提出並已被用來分析一般課堂對話的互動模式；最後關注的是學生在課堂裡專注與學業相關任務的情況（採用美國的《教學結構及學生學業反應轉寫代碼主流版》（MS-CISSAR）來記錄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結果顯示，共融環境使得聾/弱聽學生能像其健聽同伴那樣融入課堂互動，但他們的互動模式存在細微差別。此外，隨著手語技能不斷提高，健聽學生在學期結束時和聾/弱聽同伴的互動增多。結果還表明，香港共融環境中的聾/弱聽學生的學業參與度與健聽同伴相似。研究還將討論這些現象的重要性並提出建議。

參考文獻

- Biederman, Y. (2003). *Literacy learning in a bilingual classroom for deaf students: Negotiating between New Zealand Sign Language and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ith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 Lin, A. M. (2007). What's the Use of "Triadic Dialogue"?: Activity Theory,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Pedagogical Practices. *Pedagog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2), 77-94.

備註：感謝報告者同意 2014 手語雙語及聾人教育研討會統籌委員會將其摘要翻譯為中文。中文翻譯僅供參考，一切內容以英文版本為準。中英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

一般演講 8

從聾人教師的角度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宋良昇、周思嘉、姚勤敏、潘若詩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及成立雙生學校 (Twin school) 被認為是當前聾人教育領域比較有發展前景的教育模式 (Kreimeyer et al. 2000 ; Knoors 2005) , 特別是考慮到聾及弱聽 (聾/弱聽) 學生的心理社交發展因素 (Spencer 及 Marschark 2010)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教學環境包含以下特徵：1) 在班內聾/弱聽兒童的人數需達到一定數量，或成為關鍵數量 (critical mass) ; 2) 由一位普通教師和一位聾人教師或手語雙語教師進行協作教學；3) 在課堂上同時使用手語和口語作為教學媒介 (Antia 及 Metz 2014, 出版中) 。

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這一試驗性項目於 2006 年在香港成立。直至我們開展此次研究，共有 36 名聾/弱聽學生加入到該計劃內的一所主流小學，在該校聾/弱聽學生人數已達到關鍵數量。該項目的發展遵循著兩個指導原則：手語雙語和共融教育。一組聾人教師融入到該項目中，與健聽教師一起完成教學並參與其他校內課餘活動。同時，這些聾人教師還跟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緊密接觸，並近距離觀察他們的日常學習以及彼此間的溝通交流。聾人教師是計劃中的重要參與者，我們希望了解他們如何評價此項目對於聾/弱聽學生的影響。

此項研究主要針對在此計劃內工作一到六年的七名聾人教師進行個別訪談，參照這些聾人教師在學時期的學習經歷來探討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對聾/弱聽學生可能產生的影響。根據所得數據作主題分析 (thematic analysis) 後發現：1) 同時使用手語和口語作為教學媒介，有效地增加了獲取學習信息的程度，並提高了課堂參與度；2) 豐富的雙語環境有利於在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間營建積極的社會互動；3) 聾/弱聽學生在該項目可平等地接受主流課程，並不會失去正常的學習機會。

參考文獻

- Antia, S. & Metz, K.K. (2014, in press). Co-enroll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In M. Marschark, G. Tang & H. Knoors (eds.), *Sign Bilingualism and Sign Bilingual Edu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noors, H. (2005). Bilingualism and Inclusion.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Deaf – Programme and Abstract book*. The Netherlands: ICED2005 Organizing Committee, 60-62.
- Kreimeyer, K.H., Crooke, P., Drye, C., Egbert, V. & Klein, B. (2000). Acade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a Co-enrollment Mode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Deaf and Hard-of-Hearing Children.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5, 174-185.
- Spencer, E. & Marschark, M. (2010).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Educating Deaf and Hard-of-Hearing Students*.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般演講 9

從學生的角度看聾人教師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的角色

何智敏、姚勤敏、潘若詩

Jimenez-Sanchez 及 Antia (1999) 在其論文中詳細討論了專業教師和成年聾人進行合作教學對於聾或弱聽（聾/弱聽）學生及健聽學生語言和學業發展的益處。他們認為，當聾人教師成為學校的一部份並參與教導聾/弱聽學生以及健聽學生時，“最明顯的益處是全體學生都能夠參與課堂溝通……差異不再讓他們感到難堪，而是被看成是有價值且值得尊重的”（Jimenez-Sanchez 及 Antia 1999，第 223 頁）。但還沒有研究全面地考察過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如何看待聾人教師的作用以及他們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SLCO）課堂中的重要性。

本次研究希望考察學生對 SLCO 計劃有聾人教師參與其中的看法。我們邀請了就讀於小學四年級至中學一年級的四個 SLCO 班級內的 23 名聾/弱聽學生和 64 名健聽學生參與問卷調查，每個 SLCO 班級皆有五至六名聾/弱聽學生和二十至二十九名健聽學生一同學習。班內超過 60% 的課程由聾人教師和健聽教師共同教授，並使用手語和口語作為教學語言。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我們還對其中 6 名就讀於中學一年級的聾/弱聽學生進行後續訪談，以便進一步判定學生如何看待聾人教師在校內所起的作用，並考察聾人教師如何在學業和社交上給予學生幫助。問卷調查的結果表明，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都證實了聾人教師在 SLCO 班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健聽學生認可成年聾人的教師身份，並且認為他們不僅對自己的課堂學習有幫助，還讓自己獲得一門新語言，即香港手語。此外，學生還能夠感受到聾人教師在社交和情感上給予他們的幫助。而後續訪談則表明，對於聾/弱聽學生而言，聾人教師的作用尤為重要，因為這些聾人教師自身的學習和生活經驗都能為學生提供參考，學生也會和他們產生共鳴。聾/弱聽學生還認為，聾人教師是他們的榜樣，讓他們瞭解到成年聾人能夠成為怎樣的人以及他們如何在一個健聽人佔主導的社會中生活。

參考文獻

Jiménez-Sánchez, C., & Antia, S. (1999). Team-teaching in an integrated classroom: perceptions of deaf and hearing teacher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4(3), 215-224.

一般演講 10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聾健學生的社會融合

姚勤敏

儘管融入主流的聾人教育已經成為全球一大趨勢，但有關在主流環境中教育聾及弱聽（聾/弱聽）學生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聾健學生是否能進行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只是安排聾/弱聽學生入讀主流學校或接近健聽學生，這些本身並沒有為就讀公立學校的聾/弱聽學生創造足夠的社會融合條件（Antia et al. 2002），而且很多單獨進入主流學校的聾/弱聽學生可能將自己視為學校或班內的“訪客”而非“成員”。

如何讓聾/弱聽學生進入主流學校學習？聾人教育中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模式就將試圖解決這一問題。這種教育方案主要基於兩大策略：1) 安排達到關鍵數量的聾/弱聽學生進入主流學習環境；2) 讓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一同就讀手語雙語班，並且接受健聽和聾人老師的協作教學。

在本文中，我們將報告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的社會融合情況。報告主要涉及三類心理社交測量方法：1) 同輩互評；2) 健聽學生對聾/弱聽同學的態度；3) 聾/弱聽學生對自身耳聾的態度。一共有 16 名聾/弱聽學生和 289 名健聽學生參與了本次研究，實驗進行時他們就讀小學 4-6 年級。研究結果令人鼓舞。聾/弱聽學生和健聽學生都給予對方正面的同輩互評。而統計分析進一步表明，同輩互評的情況與聾/弱聽學生對自身耳聾的態度呈正相關，它同時也和健聽學生對聾/弱聽同學的積極態度有正面關聯。這些結果表明，在主流學校中結合手語雙語和共融教育的模式，將會是聾/弱聽兒童融入主流社會的一個可行選擇。

參考文獻

Antia, S. D., Stinson, M. S., & Gaustad, M. G. (2002). Developing membership in the education of deaf and hard-of-hearing students in inclusive setting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7(3), 214-229.